

顾问 王昌延

主编 黄泽新 范大江

天津 小说

十八家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 文研所

78

天津小说十八家论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天津蓟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印张 296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80563-005-4/K·002

定价: 4.20元

86

目 录

喜读《天津小说十八家论》(代卷首语)	弋兵(1)
独树一帜	黄泽新(4)
——孙犁论	
敢掣鲸鱼碧海中	王之望(44)
——梁斌论	
童心不泯 笔耕不辍	邢广域(63)
——袁静论	
方纪论	王昌定(84)
战士作家 文坛老兵	张春生(111)
——孙振论	
荷载徬徨的一员“福将”	郭武群(125)
——阿风论	
真诚的传记小说家	李绪鉴(143)
——周骥良论	
杨润身论	王昌定(156)
“一身牢落识乾坤”	楚大江(175)
——柳溪论	
工夫深处独心知	张春生(198)
——王昌定论	

学者型作家的艺术行程王 南 (220)

——鲍昌论

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自觉追求者傅正谷 (245)

——石英论

在广阔的土地上耕耘李绪鉴 (268)

——冯育楠论

向深山大海开掘艺术宝藏刘宗武 (283)

——王家斌小说创作论

在开拓中前进黄泽新 张学敏 (295)

——蒋子龙论

多重气质 多种追求黄泽新 (321)

——冯骥才论

论航鹰小说的性格美马 威 (343)

——航鹰论

从“蔡庄”到“亚马逊”张春生 (365)

——吴若增论

(注：以出生年月排列)

喜读《天津小说十八家论》

（代卷首语）

弋 兵

作为《天津小说十八家论》的第一个读者，感倒非常高兴，这不仅在于它具有史论的性质与意义，还在于它给了我许多其他作家评传所没有的启迪。

读《天津小说十八家论》，似乎面对着一幅文学历史的长卷，虽然看不到这个长卷中已然过去的往者和尚未展现的新人，但就在这一段目所能及的历史幅度内，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作家的存在都属于一种历史的现象，都在一个历史流程之中。文学的历史也象一条长河，它从古老的世纪中流过来，又向着无际的未来流去，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就是这条长河中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溅起的浪花。这些浪花被大河的激流推拥而出，姿态纷呈，虽然它们只能涌出水面一个短暂的时间，但却各自为这条长河增添了一点风采。作家自身在历史时空中的存在是有限的，而作家展现的历史风采则会被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长期保存下来。“不废江河万古流”，文学历史长河既是流动的水，又是永恒的碑，《天津小说十八家论》试图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为一批作家标定他们在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从而使关注当前文学现象的人们增添一些历史感，这无疑是很意义的。

《天津小说十八家论》按年龄序列评述了一个活动于半个世纪历史跨度中的作家群，这就使人不仅看到了作家，也看到了他们

背后共有的历史背景。老一代作家们成长于国家民族危难之秋，他们多是一手持枪一手持笔的，或者说他们手中的笔是作为抗敌救亡的武器握在手中的。他们为人民而战，也为人民而写，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们是靠了紧紧与人民群众结合才找到了战斗的力量之泉和创作的心灵之泉。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命运息息相关，也自觉地把人民群众的命运作为神圣的主题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们留给历史的作品可能有某些缺陷和不足，但作品中所表现的时代光彩则是万古不泯的。而新一代的作家则是成长于新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社会条件使他们有着与老一代作家不同的追求。他们把关注的目标从国家、民族转向社会、人生，从总体上的对人民命运的关心转向对主体的、人的命运的关心。从宏观上看他们把关注的目标放小了，放窄了，而从微观上他们所关注的人却更加放大了，更加具体了。虽然他们不再为国家民族呐喊呼号，但他们关注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心却与老一代作家们同样炽热。在艺术的总体风格上，老一代作家们更多的追求一种奉献精神，而新一代作家们则更倾向于一种表现的心态，奉献与表现并不应该彼此鄙夷，因为他们通过各自的风格追求着同一的目的，这就是人世间的真善美。有的人喜欢把不同时代的作家之间划上一个“代沟”，尽量勾勒着他们之间的区别，而《天津小说十八家论》却把他们排成一贯序列，既使人看到他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各领风骚，也使人看到他们在共同的文学历史中祖相递述；既使人看到了他们各自的历史位置，也使人看到了他们仍然遨游在同一的历史长河之中。

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的现象还表明，虽然历史并没有把作家们完全隔绝开来，但是作家们自己特有的艺术领地却把他们彻底区别开来，使得他们永远只是自己。这是由于作家的艺术领地是不能世代传袭的，作家的领地只能用自己的心灵去开拓，并以自己对生活、对美的特有理解与追求作为旗帜来相互区别的。《天津

小说十八家论》列举的作家中，有的寄情于难以忘怀的过去，有的向往着更加动人的明天；有的扎根于田野的泥土，有的跃身于改革的一线；有的瞩目于时代的潮头浪尖，有的驻足于人的心灵深处；有的敢于涉险猎奇，向骊龙颌下取珠，有的意在高山流水，于平淡处见精神；有的补缀拾遗，见人之所未见，有的发幽探微，化卑琐为神奇。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基础，不同的发展空间，不同的成长条件和机遇，这使得他们的艺术领地是互不相同的，不同的艺术领地又进一步推动了他们艺术个性的发展，而正是这些使他们彼此区别开来的艺术领地与艺术个性，形成了他们的独立的价值。读了《天津小说十八家论》，你可以用自己的标尺把他们分出强弱高低，但却无法用他们中间哪一个去取代另一个。他们都是自己独立艺术王国里的国王，但他们为开拓王国所付出的汗水，又涓滴不弃地汇入了文学历史的长河，推动了文学历史的前进。

历史的推进总是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并受到空间条件制约的。《天津小说十八家论》列举的作家大都成长于天津，或者说他们是把天津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立足点的。作为天津人，有理由为天津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这样富有光采的作家群感到骄傲，但也感到这样一个作家群在天津成长起来并非偶然。人们都知道，天津的历史文化积淀并不深厚，但却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它几度被卷入历史激流的中心，再加上它那特殊的人文、经济和地理条件，使得它成为一块文化发展的沃土，天津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出现是必然的，同时人们也深信，天津还将出现更多的有光采的作家，天津作家在推动文学历史发展中也不会是无所作为的。

独 树 一 帜

——孙犁论

黄泽新

独特风格是主要的，学人家的是为了丰富自己，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

周恩来

艺术之路和生活之路不同，它最忌讳在人们走惯了的平坦大道上亦步亦趋，它需要独特的探索，需要另辟蹊径，需要种植奇花异草，创造出人迹罕到的幽胜的艺术境界。

孙犁就是一位坚持走自己独特艺术道路的作家。几十年来，他在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批评等各个艺术领域辛勤地耕耘，他在每个领域、每种艺术形式上都有卓异的创造。其作品烙印着鲜明的个性，在我国当代文坛上，孙犁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

生活和思想的历程

孙犁于1913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他出世时，父亲在外经商，家里务农，孙犁在农村这个摇篮里长大，思想气质受到农民很深的熏陶。从农民身上吸取了正直、纯朴、忠厚、诚挚等优秀品质。这些美好的道德种子，深深扎根在孙犁的心灵中。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的教育和知识的启迪，又使它不断丰富、更新和发展。

二十年代，是军阀争权夺势，互相倾轧的时代，是封建剥削和压迫异常深重的时代，是人民群众啼饥号寒的时代。当孙犁刚

刚开始用自己纯真的眼睛观察世界的时候，连续扑入眼帘的是一件又一件饱含血泪的事件：有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朴实热情的农民，“因酒后失态”竟被作为“绑票”的强盗砍了头；有一个叫凤池叔的人，“身材高大，仪表非凡”、“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竟然穷困而死；还有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民，没有土地，没有房屋，也没有老婆，艰苦地活着，又艰苦地死去，……这些事件，深深地刺伤了孙犁稚嫩的心，使他从认识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这样，孙犁的善良的品性和冷酷的现实之间就萌生了矛盾，这个矛盾是激励他前进的巨大力量，推动着他积极求知，探索未来。

孙犁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和各种宣传新思潮的杂志。入中学后，更加酷爱读书，除了读各种进步的文学作品，还读了几种马列主义的著作，从而掌握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知识。孙犁在上学期期间，父亲请一位秀才教他读《诗韵合璧》，他兴味索然，而对有新内容、新思想的作品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现实生活在胸中沉淀的愤懑，他希望能在新书中找到答案；而新书所包含的思想智慧，又启发他深一层认识现实。从人生到文学，从文学到人生，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中，孙犁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对于孙犁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孙犁对鲁迅先生十分敬重、十分热爱。他说：

“我最喜爱鲁迅先生的散文，在青年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省吃俭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那时我正读中学，每天下午课毕，就迫不及待地奔至图书阅览室，伏在报架上，读鲁迅先生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总要读到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关于散文》）。

这段话说明他对鲁迅作品确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

种“狂热”，并非单纯地艺术欣赏，而是为鲁迅的伟大精神所感召。鲁迅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大无畏气概，充溢于作品中的崇高思想，以及他那泼辣有力的文字、严谨的现实主义方法，对于孙犁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中学毕业后，孙犁怀着青年人的热情走向社会、在北平市政府当一名小职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见到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这就使孙犁头脑中固有的矛盾——善良品德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加剧了。在那个高高的灰色围墙里，他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于是愤然离开北平，回到农村教书。教书期间，他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自己也受到农民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他的生活是清苦的，精神却是奋发的，因而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就迎着炮火硝烟走上了斗争的第一线。

抗日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伟大的转折期，也是孙犁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转折期。八年抗战期间，孙犁当过文学教员，作过新闻记者，编辑过文艺刊物，始终生活于群众之中，感受着时代风雨，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可宝贵的是，孙犁在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为自己培育出灿烂的理想之花。抗日战争，环境险恶，道路曲折，时而阴云密布，时而豁然开朗；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时而受饥寒侵袭，时而有死亡威胁，对于人们的意志、精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孙犁经受了这个考验，他不仅没有退缩、没有消沉，反而更加坚强、更加乐观。抗战前一度有过的“绝望情绪”一扫而空。革命的美好前景激励着他，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大会在我的心里感情上栽种上甜甜的、神圣的、生命力的种子，从大会以后，在我心里，就有一种急剧的激动，那就是要求一种工作上的建树，一种对人生的新的义务，我被胜利后的新中国的种种预见激动了”。“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

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二月通信》）对于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对于新中国的热烈憧憬，是孙犁工作和创作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孙犁在抗日时期思想感情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和人民群众更加亲密无间。这种情谊，是战火中锤炼的，是苦难中凝结的，因而那样深沉丰厚。孙犁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这样一件事：一九三九年冬，他从雁北采访回来，已经临近年关了，大年三十晚上，房东用黑粗瓷碗给他端来一方白豆腐，一撮烂酸菜和一个窝头，请他过年。这些食品，现在人们会觉得很粗劣。而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是多么珍贵啊！包含着多少情谊啊！这件事，孙犁极其感动，一直念念不忘。孙犁把自己看作是农民家族的一员，他对农民，没有居高临下之态，也没有盛气凌人之势，而是真心实意地热爱和尊重他们。他把农民蓬勃的爱国热情，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刻苦耐劳的品格融入到自己的心田中，丰富和充实了精神世界。

和时代、和人民、和革命的真正的完全的结合，这就是孙犁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结出的思想硕果。他的作品之所以高扬着乐观主义情绪，浸透着对人民的骨肉深情，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原因正在这里。孙犁说：“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孙犁文集》《自序》）

抗日战争结束后，孙犁怀着胜利的喜悦，轻松愉快地回到冀中，采访、编辑刊物，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并从农民那里听到“翻天覆地的新声，划时代的歌唱”，看到了农民翻身后出现的亘古未有的新气象。

一九四九年一月，孙犁紧随着冲锋的解放军战士作为第一批接管人员进入天津。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战士，一旦到达胜利的

终点，心情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所思所想是如何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历史的转机、人民的欢乐、祖国的新貌，完成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崇高职责，他连续写了许多短小精悍的新生活的速写。他说：“这些短文，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在新的生活激剧变革之时，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作及时的一唱。”（《关于〈津门小集〉》）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左的思潮不断冲击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造成了很大混乱和破坏，孙犁以其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和求实的态度，较早地意识并抵制了左的错误。一九五六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左批评右创作论》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评论中简单粗暴、断章取义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篇反左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虽然没能发表，但它表明了孙犁的政治和文艺思想。这以后，“大跃进”、“反右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裴多菲俱乐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政治运动，文艺斗争，如风如潮，一次又一次席卷神州大地，搞得人心惶惶，晕头转向。在这非常时期，孙犁一个字也没写，一句热昏的话也没说，不为政治乌云所蔽，不为淫威所屈，不为名利所诱，是孙犁最可宝贵的品德。

文化革命开始后，孙犁受到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管制，家也被抄数次，灵与肉的折磨都是很沉重的。孙犁有过苦恼、迷惘和彷徨，然而主导的是愤怒、抵制和抗争。有人劝孙犁把《白洋淀纪事》改一改，他断然拒绝了。他认为“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不只有背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在阜平》）七十年代初，孙犁被“解放”了，但思想仍被禁锢着。不能为文，亦不想为文，每日用废纸包书皮以“消磨时日，排遣积郁”，书衣上除题写书名、作者和卷数外，还记录了作者某些“感触”。后来，辑为《耕堂书衣文录》。这是一部在特殊情况下写成的书。

在那令人窒息的高压气氛中，作者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曾经有过“淡泊”之想，但是，郁积的愤怒怎么能够平息？作家的正义良心又怎么能够丢弃？因而更多的时候还是横眉怒目，拍案而起。他感慨道：“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嚎，日暮旅行，只可披斩而进也”，表露了作者强烈的愤慨。

“四人帮”倒台以后，雨过天晴，孙犁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虽是年老体衰，“然于写作一途，还是不愿停步，几乎是终日矻矻，不遑他顾，夜以继日，绕以梦魂”（《秀露集》后记）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继续着崇高的文学事业。

别具一格的小说

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其写作时代、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抗日小说，包括《白洋淀纪事》中的大多数短篇小说和长篇《风云初记》；二、土改前后农村变革的小说，包括《村歌》、《铁木前传》及部分短篇小说；三、芸斋小说。这三类作品题材、体裁、内容、表现手法各有特点，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一）抗日小说

孙犁是在抗日时期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他的文学道路的。他的小说，以抗日题材最多。抗日小说也最能体现他的个性和美学追求，因而在孙犁小说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关于抗日小说，孙犁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乱离、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

西。”（《文学和生活的路》）

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他的创作的指导思想是表现“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具体说来，就是表现农民的爱国热情，作战的英勇和高尚的品德，把他们的精神美的极致生动地再现出来。孙犁的这一艺术追求，使他的作品和那种热衷于描写劳动人民精神创伤的作品区别开来，和那些以低沉的调子描绘阴暗面的作品区别开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旋律。这一艺术旋律是和时代的步伐，和人民的心声非常谐和的。

那么，孙犁在作品中怎样实现这一艺术追求的呢？

一般地说，表现战争时期人民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和美好的品德，最直接、最便当的方法是将人们放置到严酷的战争中去，让他们在战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显示出思想光华。许多作家都是这样写的，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作品。然而孙犁没有采用这种写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不直接描写烽火硝烟的战场，不喜欢在敌我短兵相接、生死搏斗中去刻画人物，而是从生活的各个侧面和人物的各种关系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纷纭万状的战争生活。孙犁写抗日的短篇小说有二十多篇，而直接描写战斗的只有《村落战》一篇，其余的作品，有的写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有的写家庭生活、婚姻爱情，有的写后勤工作，……大都把战争推到后面，作为背景烘托人物的思想行动。如《蒿儿梁》是写军民反围剿斗争的。这样的题材，如果在别的作家的笔下，一定会出现刀与火的激烈斗争的场面，一定会谱写成悲壮的乐章。而孙犁却只撷取了妇女主任照顾伤员吃住、保护他们安全的几个生活画面，于脉脉温情之中显示了人们的铮铮硬骨。《荷花淀》也是写抗日斗争的。它的侧重点是写水生媳妇意识的觉醒，对组织妇女武装的认识，战斗场面只是轻轻地点染几笔，我们是从人物感情的流动中感受到她们那火热的爱国心。正如茅盾所指出的：“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

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从侧面反映战争生活，看似容易，实际是很困难的。因为激烈的战斗，对于人们是最严峻的考验，也最能显示人们的精神风采，容易写得悲壮感人；而人们的日常生活，矛盾冲突不那么尖锐，掩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美与丑，崇高与卑鄙，勇敢与怯懦往往不能迅速、明朗、彻底地去表露出来，如果写得不好，就会变得淡而无味，甚至琐屑无聊了。鲁迅在谈到创作时强调“开掘要深”。孙犁所以能通过普通生活题材反映时代风云变幻，正在于他在“开掘”上下了功夫，他是站在抗日这个时代的制高点上鸟瞰现实的。他注意观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抗日战争的有机联系，善于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深化作品的主题，着力表现出军人们行动的阶级之情、民族之情、爱国之情，从而使平凡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平凡的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首先欣赏一下《山地回忆》。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作品中的“我”——一个八路军干部清晨到河边洗脸，河下面有一个女孩子正在洗菜，她觉得不卫生，生气地对他嚷起来。后来，她看到这个八路军在数九寒天还光着脚丫子，便主动提出来给他做一双袜子。从此，“我”常到女孩子家去，帮她家做些事，而女孩子也果然用自己的布给他做了一双结结实实的袜子。于是，“我”就穿着这双袜子登山涉水，南征北战，直到抗日胜利。这篇小说所写的事情应该说是很小的，然而它的意义却很深。它表现了山区人民对子弟兵的真挚纯厚的感情，表现了军民之间鱼水相依的关系，表现了人民群众激荡着的爱国热情。这样小的题材为什么能够蕴含这样深厚的思想意义呢？就因为作品的立意高，开掘深，不是从一般的人情事理上去描写这件事，而是从抗日的角度，从革命的角度去观察、去表现这一事件的。

《光荣》是一篇爱情题材小说。爱情题材，由于人们天天

写，难以写出新意，写得深刻，而孙犁这篇描写普通农村青年爱情的作品，却具有不同一般的境界和格调。小说一开始就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一天傍晚，刚刚十五岁的男孩原生割完草往回走，同村的小姑娘秀梅叫住他，悄悄告诉他芦苇里有一个国民党逃兵，还带着一枝枪。这两个孩子商量一下就大胆地下了那枝枪。秀梅说：“我们也有一枝枪了，明天你就去当游击队。”这纯真而又强烈的爱国行动，埋下了他们之间友谊的种子。原生踏上征途以后，他的媳妇小五不安分起来。小五和婆婆争吵，闹着要和原生离婚，作为村干部的秀梅劝她说：“当兵是为了国家的事，是光荣的。”小五追着问：“光荣几个钱一两？……我看也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秀梅说：“光荣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光荣也不能当男人，一块过日子！这得看是谁说，有的人窝窝囊囊，吃上顿饭，穿上件衣裳就混的下去，有的人还想到比吃饭穿衣更光荣的事！”这场关于光荣的争论，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念。后来，小五抛弃原生而他嫁，秀梅则敬重原生而期待着。这位情操高尚的姑娘终于在原生凯旋归来的时候，得到了甘甜的爱情果实。《钟》、《小胜儿》、《浇园》也都写得很精彩，把个人感情和民族感情和谐而自然地融成一体，使人物的爱情生活高扬着爱国主义激情。

《风云初记》是孙犁描写抗日战争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通过对冀中人民斗争生活的描绘，深刻地反映了抗日初期复杂而微妙的阶级关系，生动地表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愿望、要求和情绪，热情颂扬了在民族危难中坚韧不拔、奋勇斗争的优秀中华儿女。小说以高庆山、春儿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同田大瞎子、田耀武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为主线。高庆山、春儿遵循着共产党的政策，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坚持进步；田大瞎子、田耀武则坚持分裂、坚持妥协、坚持倒退。结合这条主线，小说还穿插了同土匪头子高疤的斗争。高疤由私利出发，开始钻营到

革命队伍中来，尔后，又叛逃到敌人方面去。这条副线的安排，进一步显示了当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性。围绕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小说刻画了一大批人物形象，有优秀的领导者高扬、高庆山，也有普通的宣传工作者变吉哥，有意识逐渐觉醒的老一辈农民老常、老温，也有在斗争中成长的新一代农民春儿、芒种；有反动地主田氏父子，也有作恶的土匪高疤；有卖国投敌、为虎作伥的白翻译官，也有奴颜婢膝、效忠地主的老蒋，……众多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表明作者对社会的观察和把握是非常广泛的。而在形象塑造的时候，孙犁坚持从实际生活进行概括和提炼的现实主义原则，因而人物形象大都生动、丰满，具有独创性。这里特别说一下李佩钟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命运的人物。她出身在破落的封建家庭，长大后嫁给思想很反动的地主田耀武为妻，在革命潮流冲击下，这位知识妇女挣脱了家庭的羁绊，投身到革命营垒中来，反戈同公公、丈夫作斗争，最后为革命而献身。李佩钟，由地主家庭走向革命阵营，由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的娇弱女性变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那时代阶级关系剧烈变化的突出表现。李佩钟形象是孙犁的独特创造。过去，有人曾对这个形象提出批评，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这个人不是阶级的标签，它所包含的深刻内涵还未被人们认识。一旦我们摆脱教条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人物的特殊光彩就在我们面前放射出来。《风云初记》虽然没有宏伟的战争布局，没有直接描写千军万马的厮杀，然而它深入社会腠里，透视人物灵魂，以不同阶层、不同思想、不同追求的人物作为经线和纬线，构织成非常真实深刻的时代画卷。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茅盾的长篇小说《锻炼》。这部小说也是以抗日初期为背景。如果将《锻炼》和《风云初记》对照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写国统区上海，一个写解放区农村；一个写资本家的恐慌与逃跑，一个写工农群众的觉醒与斗争；一个是冷峻的批判，一个是热烈的颂扬，